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2.008

#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东西方文化考量<sup>①</sup>

张加生<sup>1,2</sup>

(1. 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2.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莫欣·哈密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以“9·11”事件给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精英人群带来的创伤为切入点,考量了该事件在后殖民时代给东方族裔造成的文化身份影响与焦虑;从后殖民视角的东方主义、文化身份两个方面对作品中关注的东西方文化走向与融合问题进行后“9·11”反思,提出美国反恐战争陷入“越反越恐”的根源在于东西方的文化对峙,摒弃“文化霸权”、加强对话、促进交流是小说所表达的真诚主旨。

**关键词:** 昌盖兹; 东方主义; 文化身份; “9·11”

**中图分类号:** I3/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5)02-0038-06

## Oriental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in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ZHANG Jia - sheng<sup>1,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by Mohsin Hamid is concerned with the social impact of “September 11” event on people from Eastern cultural backgrounds as a cut-in point,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event on Oriental intellectual groups in post-colonial era.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ost-colonial theory, analyzed the Orientalism criticism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mes reflected in the novel. It points out that in the post “September 11” era, the “War on Terror” has fallen into a worse situation. The approach to it lies in promoting cultural interaction through cultural exchange on the ground of removing the cultural hegemony.

**Key words:**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Orientalism; cultural identity; post “September 11”

### 引言

关于“9·11”小说的话题并不新鲜,但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关注的还是欧美作家创作的反映西方主流媒体声音的“9·11”创伤小说;斯肯兰在《来自恐怖》(*Migrating from Terror*)中概括后“9·11”小说特征时说:“尽管唐·德里罗和约翰·厄普代克不无勉强地提及伊斯兰恐怖分子也是人,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目前尚没有‘9·11’文本真正去关心穆斯林普通人群,就是那些具有不同政治和宗教背景的人。”<sup>[1]</sup>而2007年,莫辛·哈密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则“梳理了与反恐战争融合在一起的身份问题,即穆斯林与恐怖分子,或者说美国人与右翼新殖民分子”<sup>[1]</sup>的问题。这本“耗时6年、多次改稿的著作,因其对印巴地缘政治”<sup>[2]</sup><sup>169</sup>和后“9·11”时期东西方文化冲突等主题

① 收稿日期:2014-05-06

基金项目:南通大学人文社科处招标项目“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新发展及其批评实践”;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项目资助项目(2012-JS-242);“2012年全国博士生外国文学学术论坛”三等奖获奖论文

作者简介:张加生(1977-),男,江苏东台人,副教授,博士生,主要从事中英语言文学研究。

的深刻再现而引起了西方政界、新闻界、文学界的诸多关注。

小说叙述了一个巴基斯坦裔美国人昌盖兹(Changez)在“9·11”前后几年迥然相异的生活体验与文化体验。与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年轻人一样,昌盖兹怀揣“美国梦”,远赴美国求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并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位于纽约的一家顶级评估公司的佼佼者。然而“9·11”事件后,历经文化冲突和精神困惑的昌盖兹最终选择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到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他对一位萍水相逢的美国陌生人敞开心扉,娓娓讲述自己在美国“9·11”前后的情感遭遇和文化对峙。他的坦诚和好客,似乎在向这位美国陌生人发出友好、善意的信号,而陌生人“却有可能是前来暗杀他的美国人”,小说以赋予读者无限想象的开放式结尾结束。

奈特认为是“后‘9·11’为该小说带来了巨大成功,并使其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sup>[3]37</sup>;巴罗在介绍“9·11”小说时认为“哈米德在‘9·11’事件后高度白热化的伊斯兰恐惧症情境下,讲述了一个穆斯林人如何变为激进分子,足见历史事件对族裔身份的影响。”<sup>[4]</sup>金则认为“这部小说的叙事声音就是作者本人,带有明显的反美情绪,但小说结局很具开放性”<sup>[5]</sup>,因而留给读者很大的阐释空间。拉斯顿认为“虽然它不无挑衅,但这至少是一部构思精巧的、聪明而令人动容的小说”<sup>[6]</sup>;而国内有价值的相关研究不多,除了笔者的一篇书评外,仅有虞颖从认知诗学探讨过该作品叙事技巧,另外专栏作家苏七七作过散文随笔式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严肃而又富于感情的书,在共时共存中,更多地呈现出每一群落的现实体验”<sup>[7]</sup>,以及吴刚(该书的译者)的译后序中从美国梦的破灭稍加概述:“‘9·11’事件发生以后,昌盖兹与美国价值观之间的鸿沟凸显无遗。这些最终促成了他对美国梦的批判。”<sup>[2]178</sup>

本文认为作品中主人公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与第三世界的文化冲突以及阿富汗战争走向问题的抛出,是引起读者共鸣的原因。一方面,小说对美国的批判激起了不少美国评论者的不满,另一方面,这部小说提供了一部好的后“9·11”文本,以“9·11”事件给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带来的影响为切入点,考量了该事件在后“9·11”时期给东方族裔带来的身份焦虑与影响,并借助后殖民理论视角从东方主义批判、文化身份等方面对当前东西方文化走向与融合问题进行后“9·11”反思。

## 1 后殖民视角下的东方主义批判

后殖民理论萌芽于19世纪后半叶,是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以及女权主义理论上发展起来的。其理论的自觉和成熟以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出版为标志。在萨义德看来,东方主义批判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所谓“东方主义”是西方人出于对广大东方或第三世界地理、政治、文化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东方神话”,以标榜其优越的文化遗产和高贵的血统。二是到目前还从没出现过“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纯正的”、按照东方人的理解来建构的东方或东方主义。所谓东方或东方主义不过是“西方所了解的东方”,是西方赖以“存在的一个虚设的对立物罢了”<sup>[8]</sup>,因而“体现了狭隘与霸道的帝国主义”<sup>[9]</sup>。

其实,早在现存最晚的雅典戏剧欧里庇得斯的《酒神颂》就涉及到当时欧洲对东方的“偏颇”看法与批判,那时欧洲人眼中的东方就是用他们“极富同情心同时又居高临下”<sup>[10]56</sup>的心态创造出来的东方,“东方主义本身是政治力量和政治活动的产物”<sup>[10]203</sup>,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依然是这样:穆斯林还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穆斯林,伊斯兰教还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伊斯兰教。所以,布什总统才会在“9·11”事件后发表电视讲话说:“美国敌人不是我们的穆斯林朋友,也不是我们的阿拉伯朋友。”<sup>[11]</sup>言下之意,“东方人是我们的敌人”这样的看法在美国民众心里早已根深蒂固,而在“后‘9·11’的歇斯底里里”,这种看法更是甚嚣尘上,“每一个穆斯林哪怕只是看上去像穆斯林的人,都是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sup>[3]35</sup>。

“9·11”前,昌盖兹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知识分子一样,怀揣“美国梦”,来到美国生活、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教育、毕业后在纽约一家顶级评估公司工作。工作后,凭借自己的聪明能干,年终业绩

评估不但没有像想象中的会被解雇反而连续两年排名第一;一切似乎都在按照自己预想的轨道和节奏朝着“美国梦”步步前进,迈向象征着权力和富贵的成功。“天空蓝得非常耀眼,和我们现在头顶上这片灰蒙蒙的土黄色天空完全不同,我感觉胸臆间被某种东西充得满满的,那是一股强烈的自豪之情。”<sup>[12]14</sup>由于在美国的长期生活,他的生活习惯甚至思想觉悟也日受偏俗的东方主义影响,“当他们(第三世界的青年精英)看待自己或者本土文化时,会无意识地采用殖民者审视和评定的标准与理论”<sup>[9]</sup>,从而导致了“文化原质失真”。的确如此,昌盖兹拼命工作,表现出色,无暇顾及其余,“渐渐看起来像个美国人了”。所以当他休假回到巴基斯坦家乡时,他感觉家里的房子、屋内的装饰等一切“竟然透着一股贫贱的气息”<sup>[12]124</sup>,是那么破旧不堪,难以接受。这时的他,俨然接受了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度感觉不到自己来自东方世界。除了事业上的一帆风顺、蒸蒸日上之外,他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在希腊,他遇上了美国白人女孩艾丽卡,并且很快就陷入了爱河。事业、爱情双丰收的他不禁感慨:“我被一股前所未有的兴奋之情包围着。未来的生活中,有怎样的精彩在等着我呢?”<sup>[12]30</sup>然而,“9·11”事件让“等待着精彩”的昌盖兹一下子掉入迷茫与困惑中。由“纽约就在我脚下”<sup>[12]45</sup>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急转直下,他的生活开始扭转出既定的轨道,甚至窘迫到“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的地步。“9·11”后,在从菲律宾出差回纽约时,其他同事排在美国公民的队列里,而他则排在外国人的队列里,并被要求“脱得只剩下一条拳击短裤”<sup>[12]74</sup>接受检查,并不得不“万分孤独地一个人回曼哈顿”<sup>[12]75</sup>。这次明显带有“东方主义”倾向的屈辱检查,加之“现在,我在坐地铁的时候不止一次地遭到完全陌生人的辱骂”<sup>[12]130</sup>,以及在公司里,“我一夜之间成了小声议论和侧目而视的对象”<sup>[12]130</sup>,让他渐渐质疑美国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处事方式。美国在“9·11”前对国际移民的包容、接纳态度与“9·11”后对东方族裔群体“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转变,让他明显体验到所有来自穆斯林国家精英知识分子均被贴上东方主义的标签,在传统的“无知、奇异”基础上又成了“恐怖分子”的代名词。美国看似虚怀若谷的对第三世界移民的包容政策从来都是站在自己国家利益立场的,一方面,它广泛接纳对其社会有巨大贡献的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移民,因为他们是美国保持世界尖端技术的贡献者;另一方面,又在通过“文化霸权”、“东方主义”来强化其核心价值观;而当两者出现冲突时,自高自大的文化霸权立刻又戴上它惯有的面罩来驱赶东方精英。“9·11”事件正验证了美国的这种两面手法。作家以其自身移民体验以及对美国社会的深刻洞见批判了美国的东方主义,可谓直击要害。

## 2 后殖民视角下的文化身份

在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的全球化背景下,所谓文化身份就是探讨具有某个民族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后殖民理论尤其关注移民现象,尤其是移民的文化身份问题。也就是说,后殖民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殖民地背景的学者对自身文化身份严肃的理论反省。王宁认为:

虽有着第三世界血统但实际上却在第一世界的话语圈内身居高位并在逐步向其中心运动的知识分子精英贵族。他/她们本身就有着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或者说,他/她们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两难:一方面,作为有着东方或第三世界民族血统的知识分子精英,他/她们与真正的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因而时刻试图向居于“中心”地位的西方主流文化亦步亦趋,以寻找契机步入“中心”;但另一方面,由于他/她们操持着纯正的第一世界“英语”(English),拿着丰厚的第一世界的俸薪,因而与他们的的本族相比时“难免要流露出某种优越感。”<sup>[8]</sup>

另外,不同的阶级和民族意识也使曾经的被殖民者检视其自我身份。因为“承认丰富我们目前生活的过去传统,或者承认建立在复杂的影响和经历基础上的身份建构的过去传统,表明过去生活经历对我们身份建构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得承认自我身份也颇受当前生活的影响。”<sup>[13]178</sup>可以说,文化身份问题是每一个族裔人都无法避免的心理羁绊。莫欣·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主人

公昌盖兹同样如此。

昌盖兹,作为巴基斯坦的文化精英,凭借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全“A”的成绩,于“9·11”发生前不久,在纽约谋得了一份年薪8万美元的工作,虽然工作要求很高,但他却得心应手,应付自如,第一次评估,公司总裁吉姆(Jim)就告诉他,“你是班上第一名,好好干,你的前程远大”<sup>[12]44</sup>。而他也“感到幸福美满,浑身充满着成就感……,我就是个年轻的纽约人,整个城市就在我的脚下”<sup>[12]45</sup>。不仅如此,作为第三世界的文化精英,他甚至流露出某种优越感,因为“在我们这伙人里我是唯一一个非美国人,但我怀疑我的巴基斯坦身份也几乎令人难以觉察了”<sup>[12]71</sup>,并且“我在自己尊严所许可的范围内,让自己的言谈举止都看起来更像一个美国人”<sup>[12]65</sup>。如上文王宁所说,昌盖兹正亦步亦趋地向美国主流文化“中心”迈进。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正如他的女友艾丽卡对他说:“你對自己从哪儿来很敏感,全都写在脸上了。”<sup>[12]56</sup>也就是说,昌盖兹拼命工作,将所有的精力都倾注于工作,只是让自己无暇顾及一直困扰自己内心的身份问题,一次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差时堵车的经历,就让他直面了自己一直想逃避但最终无法逃避的问题,“我和我的同事坐在豪华轿车里,一个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吉普尼司机以一种毫不掩饰的敌意瞪着我……他的厌恶之情是那么明显,那么切身。”<sup>[12]66-67</sup>这让他一度非常生气进而陷入沉思,并让他质疑起自己一直努力建构起来的美国身份,且最终意识到这是由于他(菲律宾司机)和我都有一种“第三世界的敏感性”(Third World sensibility)。这是他第一次直面到自己的身份危机;另外,作为伊斯兰裔的他在与美国白人女友相处时甚至尝试扮演艾丽卡因患癌症而去世的前男友克里斯(Chris)角色,一方面是为了讨女友欢心,但究其原因,是他觉察到“我的身份如此脆弱,缺乏稳定的核心”<sup>[12]148</sup>。虽然说,喝着美国酒,看着美国电影和电视长大,并且结交了美国女友,让他渐渐从文化上接受了美国,并从“外表以及日常的衣着上进行自我欺骗”<sup>[14]</sup>,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一个美国人,但这正验证了他内心对自己巴基斯坦身份的无法释怀。可以说,任何一个有着移民经历的人都无法避免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

而“9·11”事件的爆发一下子放大并激化了这种文化身份的冲突。他更加摇摆不定于其自我身份问题:曾经将他当作朋友的美国同事,在从菲律宾回来时,完全抛弃了他。特别是他与女友的感情以悲剧结束,让他在“9·11”后对其不稳定的移民身份有了更深刻的体验:

我突然觉得,我想要和她沟通的种种努力之所以归于失败,或许部分是因为在诸多重大事件之中,我缺乏一根坚定的主心骨。我吃不准自己到底该属于哪里——是纽约,是拉合尔?两边都是,还是两边都不是?<sup>[12]148</sup>

另外,“9·11”后日益严重的种族问题和不断升级的印巴局势使昌盖兹越发不安,作为伊斯兰国家一员,他在智利老人巴蒂斯塔(Juan - Bautista)讲述的苏丹禁卫军的事例中明白:维系、坚守国家、民族的尊严及身份是最为根本的。在中东这样的穆斯林火药桶边上,一个巴基斯坦精英知识分子青年,无法突破加诸于他身上的桎梏,在“9·11”之后觉得自己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现代版苏丹禁卫军战士,在自己祖国面临威胁”<sup>[12]152</sup>的时候“仍然冷漠”感到羞愧。于是他决定辞去工作,回到拉合尔,回到没有身份困扰的地方。昌盖兹在文化身份的驱使下回归到他的精神原乡让人深思,他,作为东方精英分子凭借自身的天分和勤奋在美国成功地跨上了事业的远大前程,最后却因身份困惑在无法遮掩的愤怒之中回到故土又何尝不充满了矛盾?以辞职来对抗美国“9·11”后的文化政策,这无疑是对美国现行文化霸权主义的最大批判,他曾主动地去理解美国,接纳美国文化,并向女友介绍巴基斯坦的风土人情,希望以此来加强两国文化交流,达到文化融合的目的;但是,在一定意义上说,由于美国霸权导致的“9·11”,浇灭了这“微暗之火”,才让一切偏离了正常轨道而将世人的目光聚焦在这片“归零地”。

作家以一种不无狭隘的民族精神和对人类文化远景的思考介入这场深入的后殖民主义文化身份问题的讨论,批判了西方“一元中心论”的现实危害性,分析了美国文化上帝的姿态造成第三世界东方族裔的仇外情绪,崇尚武力和强权政治的“新保守主义”在“9·11”之后重新抬头,让生活在美国的东方精

英知识分子在寻找自我文化身份和世界多元文化中定位问题上日益迷茫和困惑,从而为全球文化蒙上新的“恐怖”阴影。对此,作者赋予后“9·11”世界、特别是美国以深刻的反思!

### 3 后殖民视角下的“9·11”反思

后殖民时期,美国对世界能源支配地位逐渐丧失;后冷战时期,东方世界日益兴起,给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带来了新威胁。美国于是重拾20世纪80年代的保守主义政策,奉行“美国利益至上原则”,不尊重其他国家生存与发展状况,四处充当“世界警察”角色,并将地中海以东各国家的社会生活进行对象化、本质化和刻板化处理,将其贴上“敌视”和“异域”的标签来推行其“东方主义”思想,一味倡导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因而,美国把伊斯兰教视为恐惧、劫掠的化身,把穆斯林视为野蛮人,绝不是由于“无知”和“偏见”,更多的是战略“故意”。而这种“文化优越”的霸权主义和带有战略意图的“东方主义”思想显然要遭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对,从某种意义上说,“9·11”事件是东方激进分子对美国“一元文化”思想反抗的暴虐形式。

因此,当昌盖兹看见世贸双塔倒下时,第一反应是“高兴地笑了”<sup>[12]73</sup>,虽然他也为这样的反应感到诧异甚至惭愧,但他觉得“吸引我注意的是整件事的象征意义:有人用如此明显的方式让美国弯下了膝盖”<sup>[12]73</sup>。应该说,“9·11”事件是激进分子对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文化和平演变不满而采取的针对平民的、并导致重大平民伤亡的极端恐怖行为,本身值得谴责,这毫无疑问;但值得反思的是,美国按照自己的逻辑,认为“9·11”事件是因为恐怖分子憎恨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才发动袭击的,“承受的似乎仅是无妄之灾”<sup>[15]</sup>,而不去“反省‘9·11’袭击的‘前历史’”<sup>[16]</sup>,反而借“反恐”之名,对亚洲特别是穆斯林国家采取强硬措施。

小说中,昌盖兹正告美国听众:“很显然,我们巴基斯坦人并不全是恐怖分子,正如美国人不是全是杀手一样”<sup>[12]139</sup>;相反,“巴基斯坦在美国打击塔利班武装恐怖分子的战争中还提供了帮助”<sup>[17]</sup>。这表明,伊斯兰世界的主流也是反恐的,而不是美国所想象的“非敌即友”。而对于“9·11”后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行为,昌盖兹感叹道:“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轻易地把死亡加诸其他国家的居民,令如此遥远的地方、如此多的人感到恐惧。”<sup>[12]129</sup>“新闻画面里,拥有21世纪最先进武器的美国轰炸机和地面上装备简陋、食不果腹的阿富汗部落男子形成了近乎荒诞的对比。”<sup>[12]199</sup>在此,作者对美国借助“9·11”名义发动的战争进行了强烈谴责。

而战争给美国又带来了什么呢?美国借“反恐”之名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已致使4000多名美国士兵伤亡,且陷入了“越反越恐”的境地;战争也成为美国经济陷入困境无法复苏的一大因素。所以,当昌盖兹看着美国在其邻国阿富汗的军事行为时振聋发聩地说:“必须要对这样一个张牙舞爪的美国加以制止,这不仅是为了地球上其他人的利益,对你们自己也有好处。”<sup>[12]168</sup>在反恐战争“越反越恐”的当前,“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必须做出改变,因为这将决定着下一个十年的世界发展轨迹。”<sup>[18]</sup>

作品中主人公的独白叙事与美国人的无声倾听暗示了一种东西方文化和解的途径,在这满是“美国声音”的世界,有一个美国人倾听并试图理解“巴基斯坦声音”。小说最后,作者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交融的可能提供了一套可行性方案:在买单的时候,昌盖兹说:“在你们国家,熟人之间吃饭也要AA制,而这里的规矩是要么全付,要么不付,过了一段时间后,我逐渐对两种观念都适应了,觉得各有各的道理。”<sup>[12]162</sup>作者的探索试图传递,在当今文化大碰撞的背景下,通过交锋、交流和交融,东西方完全可以摒弃隔阂、互相理解。

后殖民文化话语倡导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打破“二级”对峙,消除西方“优越”和东方“劣根”的文化偏见,摒弃“极不情愿地接受穆斯林,穆斯林只是他们想象中的穆斯林”<sup>[19]61</sup>的偏俗。全球化环境下,无论是东方主义批判问题还是文化身份认同问题,都应通过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文化交融、建立多元文化共存、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来建构<sup>[20]</sup>,这是“9·11”事件带给美国政府和人民

的应有反思。

#### 4 结语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关注了“9·11”事件对生活在美国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生活带来的冲击,表达了作家对后殖民理论所关注的东方主义批判、文化身份问题的关切,以及作家作为一个有着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化宣传大使所具备的道德意识。

另一部“9·11”小说《巨响,特近》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本可以安全生活。”在后“9·11”时期,我们怎么才能更安全地生活?正如印度圣雄甘地的名言“以暴制暴将使暴力无处不在,因为黑暗永远驱走不了黑暗”<sup>[21]</sup>,在后“9·11”时期,美国应“放下那种惯有的手里握着一把锤子,看什么问题都是钉子的幼稚做法”<sup>[22]</sup>,在同一平台上进行东西方文化交融、促进南北文化对话,这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度和人民都能够“安全生活”。

#### 参考文献:

- [1] Scanlan, Margaret. Migrating from Terror: The Postcolonial Novel after September 11[J].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2010(3-4): 266-278.
- [2] 莫欣·哈密德.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M].吴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 [3] Knight, Sheila. Out of Ruins: Reconstructing the Symbolic in Three 9/11 Novels[D].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in Huntsville, 2010.
- [4] Barrow, Daniel. Novels of 9/11[N]. New Statesman, 2011-09-05(59).
- [5] King, Bruce. The Im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ree Pakistani Novels[J]. 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2007(3-4): 683-88.
- [6] Lasdun, James. The Empire Strikes Back[ED/OL]. The Guardian, 2007-March-03: Books. <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07/mar/03/featuresreviews.guardianreview20? INTCMP = SRCH >
- [7] 苏七七.善意与聪明[ED/OL].(2012-6-25).http://miubanshuji.blogbus.com/logs/48506452.html.
- [8] 王宁.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54-62.
- [9] 康燕彬.狄金森的东方[J].外国文学,2012(5):33-39.
- [10]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 [11] Bush, George W. September 20, 2001[Z].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ddress, 2001.
- [12] Hamid, Mohsin.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M]. Florida: Harcourt, Inc., 2007.
- [13] Cheng, Vincent J. Inauthentic: The Anxiety over Culture and Identity[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P, 2004.
- [14] Morey, Peter. The Rules of the Game have Changed: Mohsin Hamid's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and post-9/11 fiction[J].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2011(2): 135-46.
- [15] Breithaupt, Fritz. Rituals of Trauma: How the Media Fabricated September 11[J].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September, 2003(11): 67-81.
- [16] 但汉松.9·11小说的两种叙事维度[J].当代外国文学,2011(2):66-73.
- [17] Harnell, Anna. Moving through America: Race, Place and Resistance in Mohsin Hamid's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J].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2004(3-4): 336-348.
- [18] Watkins, Morgan. A Decade Later[J]. Quill, 2011(5):14-20.
- [19] Daniel, Norman. The Arabs and the West: The Making of an Image [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0.
- [20] 马翀炜,戴琳.民族文化遗产的国家认同[J].云南社会科学,2013(4):96-100.
- [21] Dorfman, Ariel. Novels of 9/11[N]. New Statesman, 2011-09-05(59).
- [22] 张加生.从德里罗“9·11”小说看美国社会心理创伤[J].当代外国文学,2012(3):77-85.